



复旦大学中文系 编

卿云集

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十五周年

纪念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复旦大学中文系 编

卿云集

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十五周年

纪念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卿云集: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 / 复旦大学中文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8
ISBN 7—5325—3125—2

I. 卿... II. 复... III. ①汉语—研究—文集②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1601 号

卿 云 集

——复旦大学中文系七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

复旦大学中文系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3 插页 5 字数 1,040,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125—2

I · 1520 定价: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前 言

陈尚君

2000年1月初,在欢庆新千年、新世纪到来之际,复旦大学中文系几代教师同聚一堂,畅叙所怀,追溯本系的发展历史,深切怀念为本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前贤往德。于是有编辑这本纪念论文集的动议提出。按照一般的说法,七十五周年不是一个大庆的年度,但对于1925年成立的本系来说,在世纪之交,正好走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有着特殊的意义。集名取自古歌《卿云歌》,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两句,是复旦大学的校名所出,“卿云”是吉庆祥和的象征,也寓意文彩变化,足以体现中文系的学科特点。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正式建系是在1925年秋,初建时的名称是中国文学科。其前身是复旦大学国文部。1905年复旦公学成立之初,就很重视学生的国文训练。1912年后开设三年制的大学预科,要求文、理两科学生都要修习国文,设国文部统负其责。1917年复旦公学正式改名复旦大学,更加重视国文教育,规定学生国文及格方得领受文凭。“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外来文化的冲击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学的看法,建立和研究新文学更显得重要和迫切。1924年夏间,前国文部主任邵力子(仲辉)先生向学校行政府提议改国文部为中国文学科,主要动因是国文部

“为便利一般学生计，偏重于普通应用方面”，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被外来的东西洋文艺思潮所激荡，一面引起研究文艺的冲动，一面以中国文学的比较落后为可耻，而抱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弘愿的颇有其人，本大学正应给予他们一种整理创造的机会”（刘大白《中国文学科的过去未来》）。这一提议很快得到校方的批准，仅因学生宿舍不够，到次年秋方得正式成立。可以说，本系的成立，适应了“五四”以后新文学发展的需求，是新旧学术、东西文化交相激荡的必然结果。最初所确定的“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办系宗旨，也体现了兼容并蓄、继承创新的精神。

从创建到1949年，中文系历任系主任是叶楚伦教授（1925）、刘大白教授（1926）、陈望道教授（1927—1930）、孙俚工教授（1931）、谢六逸教授（1932—1937）、陈子展教授（1937—1949）、应功九教授（上海补习部）。先后任教的著名教授有邵力子、夏丏尊、洪深、郑权中、方令孺、方光焘、乐嗣炳、张世禄、赵景深、蒋天枢、章靳以、李青崖、王玉章、任中敏、徐中舒、傅东华、饶孟侃、叶圣陶、曹聚仁、刘大杰、汪馥泉、卢冀野、汪旭初、张遵骝、赵宋庆、胡文淑、汪静之、许杰、顾实、姚蓬子等，除部分专任教授外，也有一些是曾短期任教或曾兼任教职。

中文系设立之初，课程设置“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为研究基础”，“更设立若干专门课程，以便学子作精深之研究”（见《三十年的复旦》中国文学系部分）。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基本沿续这一宗旨。在此谨引用当年的两份教学大纲，以见当时教学的主导思想和课程开设情况。1933年的教学大纲：“一、本系之设的主要目的：在以现代眼光，研究历代文学，以世界眼光，创造本国文学。施教方针为：1. 养成学生有探讨整理本国文学之能力。2. 能创作本国文艺。3. 能理解世界文艺思潮。二、本系必修学程（全校必修国文学程除外），本系学生非习完之，不得

毕业: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文选、诗选、修辞学、文字学、诗歌原理、小说原理、戏剧原理、文学批评、文艺思潮、艺术论。”(1933年《复旦大学一览》中国文学系部分)1937年修订的大纲则提出培养宗旨是“研究历代文学及创造新文学”、“养成学生有探讨整理本国文学之能力,养成文艺创作之技能”、“注意语文的实际应用”,设置的专业必修课程,除前此规定的文学概论、文艺思潮、中国文学史、修辞学、文字学、文学批评外,其他课程调整为历代文选、历代诗选曲选、诗词小说选、写作练习、教育通论、文法研究等(《二十七年春复旦大学一览》)。这一时期的中文系学生,已具有“发表能力发达”和“都有现代的文艺意识,能以此意识去鉴赏批评我国文艺”(陈望道《中国文学系概况》,见1930年毕业纪念刊)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中文系教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已形成独立而深入地研究学术的良好风气,其中陈望道深研语法修辞,所著《修辞学发凡》是中国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刘大白教授的新诗写作和研究、夏丏尊教授的翻译研究和国语教学研究、谢六逸教授的日本文学和神话研究、赵景深教授的戏剧和通俗文艺研究、陈子展教授的文学史研究、蒋天枢教授的清代学术研究和《楚辞》研究,皆足代表当时的学术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大部分师生西迁,中文系也由系主任陈子展教授带领十多名教授,随迁到重庆,先后在菜园坝、北碚黄桷镇、东夏坝,继续授课讲学。留沪的部分师生,则在李登辉校长安排下,在租界开办复旦大学补习部。虽因战乱而学生锐减,但中文系师生依然弦歌不辍,保持了旺盛的入学热情。抗战胜利后,中文系师生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维系了新文学以来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现实和国家前途的传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本系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1949年8月,同济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由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和上海学院四校的中国语文系合并组建新的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原任教于同济大学的郭绍虞教授、暨南大学的吴文祺教授、刘大杰教授和胡裕树先生、沪江大学的朱东润教授、余上沅教授、震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以及圣约翰大学的王欣夫教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张世禄教授、南开大学的李笠教授,在南京刚毕业不久的蒋孔阳、濮之珍夫妇。由于有了这一群著名教授的加盟,中文系的学科结构更为完备合理,并形成了具有独特优势的一批专业方向。后来被称为“中文系十老”的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吴文祺、张世禄、蒋天枢、赵景深、刘大杰、王欣夫十位著名教授,此时都在中文系任教,开创了中文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其中陈望道教授和郭绍虞教授的文法修辞学研究、郭绍虞教授和朱东润教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朱东润教授的古史和传记文学研究、陈子展教授和蒋天枢教授的《诗经》《楚辞》研究、吴文祺教授和张世禄教授的古代汉语史研究、赵景深教授的元明清戏剧史研究、刘大杰教授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王欣夫教授的文献书目学研究、李笠教授的传统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吴文祺教授和贾植芳教授的现代文学研究,皆足代表当时国内该领域的领先水平。当时还很年轻的胡裕树先生转治现代汉语语法,王运熙先生研究乐府诗和唐代文学,蒋孔阳先生专治文艺学,也在各自领域初露头角。可以说,到五十年代中期,复旦大学中文系已进入国内一流大学中文学科的前列。

当时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是郭绍虞教授(1949—1957)和朱东润教授(1957—1966)。为了进一步展开科学研究,1955年成立了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由陈望道校长兼任研究室主任;1959年又成

立中国文学研究室,由郭绍虞教授任主任。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仍以老一辈学者为主,他们在接触到新的思想和方法以后,努力希望融入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去,如刘大杰教授于1957年和1962年完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新版的修订,郭绍虞教授也于1959年出版了新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同时,也开拓了一些新的课题,朱东润教授于1959年完成了《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选集》,赵景深教授出版了《元明南戏考略》等一组专著。王运熙先生出版了《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蒋孔阳先生出版了《文学的基本知识》、《论文学艺术的特征》,也引起很广泛的影响。此外,这一时期很强调开展教师与学生共同参加的集体科研,当时撰写的著作和教材有《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国现代文学史》、《李白研究》、《文法简论》等,这些著作虽明显地受到当时风习的影响,但参加的不少学生因此而引起研究的兴趣,以后得以转入专业教学和研究。

这一时期,中文系的学制由四年制本科,1955年改为五年制本科。专业培养目标,五十年代初所定为“高等学校语文系助教和中等学校语文老师”、“中国语言文学的初级科学研究人才”以及“文化部门工作干部”,到五十年代末修改为“有比较深广的语言文学的科学知识,能够从事科研和中等以上学校教学的语文工作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本科专业的培养逐渐趋于专门化,从1958年开始,本科分设语言和文学两个专业。以后虽有多次的变化,这一基本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从1983年开始,定名为中国文学和汉语言学两个专业,至今未变。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全国仅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两校招收汉语本科专业,本系为各高校汉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做过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同时,研究生教育也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起步,1960年招收副博士(即硕士),截止“文革”开始,先后培养研究生64名,虽然当

时没有实行学位授予制度,但这批研究生多数成为国内各高校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本系受教育部委托,负责多项高校统编教材的编写任务,朱东润教授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郭绍虞教授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胡裕树教授主编《现代汉语》、刘大杰教授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当时仅出版上册,“文革”后由王运熙、顾易生主持完成后两卷的编写)。这批教材的编写,集中了上海和江苏的一批优秀学者参加工作,在教材体系、章节处理、内容创新、文献发掘诸方面,都足以代表了当时的高水准,在全国影响巨大。新时期稍作修订,至今仍为许多高校沿用而不废。

文化大革命期间,本系和全国所有的高校一样,教学研究工作的完全处于瘫痪停顿状态。执着地热爱专业研究的多数教师,在这种环境中始终没有轻言放弃,继续进行个人课题的探索研究。这些潜在研究和写作的成果在“文革”后得以问世,其中有郭绍虞教授的《宋诗话考》、朱东润教授的《杜甫叙论》、陈子展教授的《楚辞直解》等。许多当时的中青年教师也依然潜心读书,思考学术,这些积累也使他们在重新获得学术研究的机会后,得以很快进入状态,恢复元气,迅速迈入一线学者的行列。“文革”后期,本系一批老教师有机会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先后完成《旧唐书》和《旧五代史》,以及《春秋左传集解》的整理,是特别时期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从1971年开始,本系招收了六届工农兵学员,分设了文学评论、文艺创作和汉语三个专业,以及两届研究生试点班。虽然面临种种压力和干扰,本系教师仍努力设法把课程开好,辅导学生学习,使入学时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学员,专业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有些成为著名作家,有的留校任教,近年已担任博士生导师。

1977年“文革”结束,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第二年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本系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此后一段时期担任系主任的朱东润教授(1978—1980)、胡裕树教授(1980—1982)、章培恒教授(1982—1985)团结全系教职员工,为开创新时期中文系的全面发展,作出了许多具有长远学术眼光的重要举措。在此可以提到的,一是适应新时期的社会需要,重新调整和构筑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二是引进和选留了一批有学术前途的中青年教师,改变了中文系教师的原有结构,完善了学术梯队的建设。仅1981、1982年两年间,就从两届本科生和两届研究生中,选留师资27人。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确保了本系学术研究后继有人,长盛不衰;三是为适应教学科研重心的变化,设置了一批新的所室;四是为提升教育层次,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扩大为国内高校培养师资的规模;五是着手策划一些能代表中文系学术水平的大型项目;六是开始走出国门,增进与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从中汲取学术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其后由徐鹏教授(1985—1988)、陈允吉教授(1988—1994)、朱立元教授(1994—1997)和陈尚君教授(1997—2001)主持系政的几届中文系班子,继续上述的主要工作目标,取得进一步的拓展:本科教学结构更趋合理系统,适应了试行学分制对课程开设的要求;研究生培养层次和规模不断提高扩大,逐渐接近并超过了本科生的招生人数,实现了向以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材为主的目标;落实并逐步完成了一批大型研究课题,保持了本系在国内中文学科中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的范围,与国外十多所大学的中文院系建立了正式的学术交流和互派师生的关系,本系先后有六十多人次教师到国外担任教职,每年来访的国外学者和来本系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也逐年增加。

八十年代前期,学校新设立了一批系所,中文系的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1981年,经高教部批准,在原中国文学研究室和语法

修辞逻辑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简称语文所),先后由王运熙教授(1981—1995)和黄霖教授(1995至今)担任所长。语文所有独立编制,以研究工作为主,先后设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语法修辞研究室、吴语方言研究室、理论语言研究室和美学研究室,教学、研究生培养和行政管理方面,则由中文系统一协调安排。语文所的设立,为中文系科的发展争取到更多的生存空间,使一部分教师得以有较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一批重大集体项目得以顺利进行。1983年,为适应古籍整理工作的展开,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一部分教师离开本系专事研究工作;1984年,为适应对外教育的需要,学校成立了外国留学生部(1987年改称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又有一批教师转而专门从事留学生教育。1989年又成立了台港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都由中文系所教师兼任,不设独立的编制。

八十到九十年代,是中文系学术研究的丰收时期。老一辈的学者,晚年还始终坚持不懈地研究进取,郭绍虞教授编选《清诗话续编》、朱东润教授《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陈子展教授《诗经直解》、张世禄教授《古代汉语》、吴文祺教授主编《辞通补编》、赵景深教授《中国小说丛考》、蒋天枢教授《楚辞论文集》等,留下了他们最后的学术遗产。他们的著作理当为后学所宝重,《陈望道文集》、《照隅室文集》、《朱东润传记文学全集》作了部分的汇集,更多的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总结。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文系、语文所分别组织人力,精心策划,由著名学者领衔,上马了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有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许宝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王运熙、黄霖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等,经过多年或十多年的认真编撰,九十年代都已先后完成。同

时,一批具有学术创见的个人研究著作,也在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蒋孔阳教授《德国古典美学》、贾植芳教授《历史的背面》、王运熙教授《文心雕龙探索》、刘季高教授《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章培恒教授《洪昇年谱》、徐鹏教授《孟浩然集校注》、潘旭澜教授《太平杂说》、李庆甲教授《文心识隅集》、陆树仑教授《冯梦龙研究》、施昌东教授《美的探索》、陈炳迢教授《辞书概要》、王永生教授《鲁迅文艺思想初探》、叶易教授《中国近代文艺思潮史》、陈鸣树教授《文艺学方法概论》、王水照教授《苏轼论稿》、濮之珍教授《中国语言学史》、许宝华教授、陶寰博士合著《上海方言辞典》、汤珍珠教授等《宁波方言辞典》、周斌武教授《汉语音韵学史略》、李平教授《中国地方戏初探》、宗廷虎教授《汉语修辞学史纲》、范晓教授《三个平面的语法观》、胡奇光教授《中国小学史》、吴中杰教授《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应必诚教授《论石头记庚辰本》、王继权教授《郭沫若年谱》、丁锡根教授《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陆士清教授《台湾文学新探》、徐志民教授《欧美语言学简史》、江巨荣教授《古代戏剧思想艺术论》、吴立昌教授《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陈允吉教授《唐音佛教辨思录》、蒋凡教授《周易演说》、黄霖教授《金瓶梅考论》、李熙宗教授《修辞新论》、唐金海教授《巴金年谱》、孙锡信教授《汉语历史语法丛稿》、游汝杰教授《中国文化语言学导论》、杨明教授《刘勰钟嵘评传》、朱立元教授、张德兴教授《现代西方美学史》、陈思和教授《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许道明教授《海派文学论》、王振复教授《周易的美学智慧》、朱文华教授《传记通论》、申小龙教授《中国句型文化》、杨剑桥教授《汉语现代音韵学》、徐志啸教授《楚辞综论》、刘明今教授《方法论》、马美信教授《唐宋派文学编年》、骆玉明教授《徐文长评传》、陈尚君教授《全唐诗补编》等。八十年代以后留系工作的一批具有博士学位甚至博士后经历的中青年教师,他们的著作中更多地具有了当代学术的新气象,可以在此

举出的有：李祥年教授《汉魏六朝传记文学论稿》、李振声教授《季节轮换》、戴耀晶教授《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汪涌豪教授《范畴论》、郑元者教授《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郇元宝教授《在语言的地图上》、吴礼权副教授《阐释修辞论》、陈引驰副教授《隋唐佛教与中国文学》、吴兆路副教授《性灵派研究》、殷寄明副教授《语源学概论》、查屏球副教授《唐诗与唐学——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严锋副教授《现代话语》、王宏图副教授《快乐的东涂西抹》、张岩冰副教授《女权主义文论》、李钧副教授《存在主义文论》、朱刚博士《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张宝贵博士《杜威与中国》、张新颖博士《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等。

在本科教学方面，本系一直非常重视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内容改革和教材建设。课程设置本着专业系统教学和学生能力素质培养并重的原则，形成相对稳定的课程结构。要求文学、语言专业的学生都必须修读《文艺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导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美学》、《写作》等十门基础课，鼓励教师多开选修课，规定学生必须修读一定数量的文史哲互选课和文理综合课，要求学生在本科期间必须选读相当数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和现代学术论著。教学中则要求教师能更多地融入个人的研究创见，能及时地反映中外学界的最新动向，注意教学内容的系统和更新，引导学生学会用自己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中外文学现象。这些举措，都有利于学生能力和眼光的培养。教材建设方面的重要收获，则有胡裕树教授主编《今日汉语》、王运熙教授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吴中杰教授《文艺学导论》、章培恒教授、骆玉明教授主编《中国文学史》、陈思和教授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最近二十年中文系的毕业同学，无论继续修读研究生学位、从事教育文化新闻方面的专业工作，还是到机关企业从事

行政管理工作,都有非常不错的业绩,不少已在各自领域卓然成名。

本系是1978年首批招收研究生的系科。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后,本系即获得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各体文学和汉语史四个博士学位授予点,以后逐步发展和并合,到九十年代中期,已有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汉语和汉语史六个博士学位授予点,另有九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即上述六个博士专业再加上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和理论语言学三个专业。1998年全国学位点专业调整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并入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现代汉语和汉语史合并为汉语言文字学,理论语言学扩展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改称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同时,获得了全国首批博士点一级学科授予权,增设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从1981年起,截止2000年底,本系共有212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379人获得硕士学位,他们多数走上了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岗位,发挥了学术骨干的作用,已有几十人担负起了博士生指导教师的责任,许多人在国内和国外的大学中担任了院系行政的主要责任。

本系的上述学术和教学成果,在历次学术评奖中得到较充分的肯定。在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评审中,本系有九项论著获奖,其中蒋孔阳教授的《美学新论》获得一等奖;在第二届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又有五项论著获奖,其中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获得著作一等奖。以上两次获奖数,均约占全校文科获奖数的三分之一。在首届全国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评审中,上海市有十项成果获奖,其中复旦大学获五项,中文系即有许宝华、汤珍珠主编《上海市区方言志》、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和王水照《苏轼论稿》三项。此外,还获得包括国家图书

奖、上海市社科奖等在内国家级和省部级社科、图书奖达五十多项。在已评定的两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中,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艺学美学系列教材建设分获一等奖,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改革获得二等奖。同时,也带动了全系学科建设的发展。1986年,在首次全国重点学科评审中,本系文艺学学科被评定为该学科唯一的全国重点学科。2001年的第二次全国重点学科评审,本系中国古代文学和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得以进入全国重点学科的行列。1995年,中文系被国家教委评定为文科基础教育和人才培养基地。1997年,文艺学和中国文论学科被列入学校211项目资助的重点学科,汉语语音实验室也列为校重点建设实验室。

客观地说,由于人事交替,学科变化,本系的学术格局和优势也有了一些突出的变化:文艺学学科的西方美学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唐宋文学方向、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现代汉语语法学、修辞学、方言学方向、汉语史音韵学方向、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学科的文化语言学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方向,都还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学术优势;原有优势的先秦文学、戏剧史、汉语史训诂学、理论语言学等方向优势已不那么明显;有的已失去优势。这是需要我们冷静思考、认真对待的。

回顾中文系从建系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说已有的成绩和现在的格局,是几代教师持续努力的结果。如果作一个不太恰当的划分的话,我觉得大约经历了五代人,他们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的学术教育环境中,为中文系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第一代学者出身于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他们身处社会和学术的大变动时期,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许多人是清末民初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参加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贡献。他们有传统学术的深厚素养,又接受了西方学术

的多方熏陶,对新文学的发展和现代语言学的建立怀抱着极大的热忱,他们为传统旧学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一批优秀著作成为各自领域的学科奠基之作。他们献身教育,培育人才,奠定了中文系的学术格局和学术规范。他们中的许多人得享遐寿,他们的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他们的治学精神极大地影响和鼓舞着以后的几代人。

四十年代或稍前完成学业担任教职的可列为第二代,他们在那时学术上已走向成熟,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努力地跟随时代发展,勇于提出自己的学术创见。虽然或曾遭遇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依然坚持真理,不改初衷。到八、九十年代,他们成为各自专业全国有影响的学术领头人,他们的学问和人格获得学界广泛的尊重,他们为中文系学科建设所作贡献将使后学长期得益。

五十年代进入大学学习,“文革”前已在本系任教的教师,大致可列为本系的第三代。他们经历了少年时期的世乱,对五十年代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饱含热情,真诚地接受新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同时又从当时在第一线任教的老教师中领悟到为学为人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希望在旧学和新知的融通中开拓新的学术空间。但在他们学术思想趋向成熟,可望大展身手的时候,极左思潮引致“文革”动乱,被整整耽搁了十多年。进入新时期,他们与时俱进,厚积勃发,成为八、九十年代中文系的学术主力。

第四代大约以“文革”后留校任教者为主,其中包括了遭逢“文革”毕业的大学老五届、中学老三届、工农兵学员和高考恢复初期入学的本科生、研究生。他们在求学或工作初期,因“文革”的变乱而中止学业,放弃专业,在农村、工矿、部队、机关曾有五到十年实际工作的经历,在重获专业学习或教学研究的机缘后,无不奋发努力,搏击进取,发展迅猛。他们阅历丰富,思想开放,敢于进取,勇

于开创,在最近二十多年的中国学术大转型、大发展时期得以大显身手,现在已成为中文系教学科研的中坚力量。

第五代学者大多出生于六、七十年代,接受了中学到大学的系统严格的训练,又曾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经过了严格的专业培养,大都拥有博士学位,外语掌握娴熟,既有扎实的专业传统学术的根基,又对当代西方学术有深入的钻研和系统的把握。他们的治学在努力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当代学术的崭新面貌。他们现在是中文系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主力军,他们代表了中文系的未来。

最后应该说到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和学风特点。这很难概括,而且各人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在此仅谈我的个人理解和看法。几年前,我在为本系学生论文集《文笔鸣凤》所写后记中概括为“阔大而不空疏,踏实而不拘执,通达而不随意,求新而不务奇”几条,在编录本集过程中,读到大量前贤的论著,阅读了一些系史资料,觉得上述的概括还是很表面的。复旦大学所在的上海,是中国近代受西方学术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大都市,是“五四”新文化的重镇,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大本营。中文系身处这样特殊的文化环境中,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就以“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自己的职志,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气度和开拓进取的勇气。几十年间,集合了海内外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历任的中文系主政者,也都以尊重旧学硕德、鼓励创新开拓的态度,让各种不同学术流派的学者有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其中最优秀的一批学者,特别致力于向西方学术学习,从中汲取新的思想和方法,以期建立中国语言、文学的新体系。陈望道教授在将《共产党宣言》译介到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语法学、修辞学的研究方法用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之中,为汉语语法学、修辞学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朱东润教授致力于将英国传记文学的作法引入中国文学的研究和传记的创作,